

我们共同的未来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编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我们共同的未来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 译

夏莖堡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UR COMMON FUTURE

©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87.

Reprinted 1987 (three tim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据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三次印刷本译出

责任编辑：张光勤

封面设计：丁品

我们共同的未来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译 夏菴堡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外交部街甲 31 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9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12.25 字数：185000

1990 年 12 月第 1 版 198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2-0233-8/F·8 定价：4.95 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这个委员会于1984年10月根据1983年联合国第38届大会通过的38/161项决议成立后，即在委员会主席、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的领导下，集中世界最优秀的环境、发展等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用了900天时间，到世界各地实地考察，写成了这份报告。1987年2月，委员会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八次委员会上通过了这项报告，它后来又经第42届联大辩论通过。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审查世界环境和发展的关键问题，创造性地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现实行动建议，提高个人、团体、企业界、研究机构和各国政府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认识水平。作为委员会的一项主要工作成果，这份报告是关于人类未来的重要文献。它以丰富的资料论述当今世界环境与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处理这些问题的具体的和现实的行动建议。它于1987年4月出版后，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以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翻译出版。

我国正致力于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中译本的出版，就是希望借助于世界环境和发展专家的这份权威报告，提供关于当今世界环境现状及其潮流的信息，以及有关环境政策思想的借鉴。相信它能得到中国各阶层读者特别是环境保护工作者的欢迎。

本书根据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第三次印刷本译出。对牛津大学出版社给予的合作，世界知识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国家环境保护局积极支持本书中译本的翻译出版，该局

外事办公室承担了翻译校订的全部组织工作、谨此一并致谢。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王之佳、柯金良、张崇贤、梁思萃、孟纪斯、赖荣源、赖洪、张世钢、王兴浩、张兴国、王德辉、汤大纲、夏军、周俭、张冀强、彭坚、史燕豫、李本骐、鲁威，全书由夏益堡统一校订。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成员

- 主席:** 布伦特兰 (GRO HARLEM BRUNDTLAND) (挪威)
- 副主席:** 卡利德 (MANSOUR KHALID) (苏丹)
- 委员:** 阿格尼利 (SUSANNA AGNELLI) (意大利)
- 阿尔-阿塞尔 (SALEH A. AL-ATHEL) (沙特阿拉伯)
- 奇德泽鲁 (BERNARD CHIDZERO) (津巴布韦)
- 凡迪卡 (LAMINE MOHAMMED FADIKA) (科特迪瓦)
- 赫夫 (VOLKER HAUFF) (联邦德国)
- 伊斯特凡·朗 (ISTVAN LANG) (匈牙利)
- 马世骏 (MA SHIJUN) (中华人民共和国)
- 博特罗 (MARGARITA MARINO DE BOTERO) (哥伦比亚)
- 辛夫 (NAGENDRA SINGH) (印度)
- 诺古尔拉-奈托 (PAULO NOGUEIRA-NETO) (巴西)
- 来多三郎 (SABURO OKITA) (日本)
- 兰夫尔 (SHRIDATH S. RAMPHAL) (圭亚那)
- 拉克尔肖斯 (WILLIAM D. RUCKELSHAUS) (美国)
- 萨赫浓 (MOHAMED SAHNOUN) (阿尔及利亚)
- 沙利姆 (EMIL SALIM) (印度尼西亚)
- 夏义伯 (BUKAR SHAIB) (尼日利亚)
- 苏可洛夫 (VLADIMIR SOKOLOV) (苏联)
- 斯塔诺夫尼克 (JANEZ STANOVNIK) (南斯拉夫)
- 斯特朗 (MAURICE STRONG) (加拿大)

秘书长: 麦克尼尔 (JIM MACNEILL) (加拿大)

首字母缩略词表

ATS	南极条约系统
CCAMLR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
CIDIE	国际发展机构环境委员会
CMEA	经济互助委员会
DIESA	联合国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ECB	联合国环境协调委员会
ECE	欧洲经济委员会
EEC	欧洲经济共同体
EEZ	经济特区
ELC	环境联络中心
FAO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GATT	关税与贸易总协议
GDP	国内总产值
GEMS	全球环境监测系统
GESAMP	海洋污染科学专家组
GNP	国民生产总值
IAEA	国际原子能机构
ICRP	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
ICSU	国际科学协会理事会
IDA	国际发展协会
IGBP	国际陆界圈和生物圈工程 (属国际科学协会理事会)
IIED	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ILO	国际劳工组织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TU	国际电讯联盟
IUCN	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同盟
IWC	国际捕鲸委员会
MVA	制造业增加值
NCS	国家保护战略
NGO	非政府组织
NICs	新的工业化国家
NUSS	核安全标准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DA	官方发展援助
PPP	污染者付款原则
SCAR	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
TNCs	跨国公司
UNCHS	联合国人类居住中心 (HABITAT)
UNCTAD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UNEP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SCO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UNIDO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WHO	世界卫生组织
WMO	世界气象组织
WRI	世界资源研究所
WWF	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

术语注释

资料中的数据是按照国家的分类提供的。“工业化国家”和“发达国家”一般系指联合国分类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发展中国家”，除特别指明外，系指联合国分类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国家及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除文章特指外，一般系指联合国定义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国家。

除特指外，文章中用的“吨”，系指公吨（1000公斤或2204.6磅）。美元指目前美元或特定年份的美元。

中 文 版 序

我们热烈祝贺《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文版问世。它的出版，对于中国公众了解世界环境与发展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提高全社会的环境意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有益的政策思想，推动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成员们，受托于联合国第 38 届大会，在布伦特兰夫人领导下，系统地研究了人类面临的重大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以“持续发展”为基本纲领，从保护和發展环境资源，满足当代和后代的需要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政策目标和行动建议。报告中阐述的指导思想是积极的，对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研究报告把环境与发展这两个紧密相连的问题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只能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持久、稳定的支承能力为基础，而环境问题也只有在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中才能够得到解决。因此，只有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掌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才能使这一涉及国计民生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得到满意解决。《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必须从现在起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两个重大问题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制定正确的政策并付诸实施。错误的政策和漫不经心都会对人类的生存造成威胁。严重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已经出现，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加以改变。

保护环境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正日益引起各国政府的重视。中国政府把保护环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列入了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根据中国国情，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

护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加以实施。我们确定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的战略方针。在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大力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努力开展对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整治”是我国环境保护政策的核心。近几年,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以加强管理为中心。依据《环境保护法》,加强监督管理,促进污染防治,以实现与国民经济的同步发展。中国是发展中的国家,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造福人民。创造适宜、美好的生活环境,是与发展经济的目标相一致的。

威胁生态环境的酸雨、二氧化碳大量排放引起的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的破坏等问题都是全球性的。所以,保护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为维护人类的生存环境而奋斗。环境问题和持续发展目标,只有在国际合作的条件下才能获得解决。《我们共同的未来》为各国采取一致行动提供了基础。随着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一定能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把人类文明推向前进,为我们的后代建成一个发达的社会,为他们留下一个美丽、舒适和有持久支承能力的地球。

宋 健

1988年9月22日

前 言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应联合国大会的紧急要求，负责制订“全球的变革日程”：

提出到2000年乃至以后实现持续发展的长期环境对策；

提出将对环境问题的关心变为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和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处于不同阶段的国家之间更广泛合作的方法，进而实现共同的、相互支持的目标，这些目标重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研究能使国际社会更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协助大家对长远的环境问题建立共同的认识，并为之付出必要的努力，以便成功地解决保护环境和提高环境质量的问题；

制订出今后几十年中的长远行动计划，并确立世界社会的理想目标。

1983年12月，当联合国秘书长授命我成立一个独立的特别委员会，并任命我为主席来处理这个对世界社会的重大挑战时，我清楚地意识到，这绝非是轻易的使命和责任，况且当时我作为党的领袖还要负责日常事务，使这件事看起来十分困难。联大的要求看上去似乎也不现实，而且过于雄心勃勃。与此同时，对于我们自己是否具有处理并且有效地解决这些全球性重大问题的能力，国际社会明显表现出一种广泛的不信任和不理解。

现实是严峻的，不容忽视的。既然对于这些根本性的严重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那么别无他路，只能一往直前地去摸索解决它们的方法。

当联合国秘书长授命于我时，我的想法就是这样。他的解释

令我无法反驳：没有另外一个政治领袖成为首相时已具有作为数年环境部长的国内和国际的政治斗争背景。这就给予人们一些希望：在中央政治决策中，环境并非注定总是要作为次要问题来对待。

最后，我决定接受这一挑战，接受面对未来，保卫后代人利益的挑战。因为，很明显，我们需要有进行变革的使命感。

我们处在各国历史的这样一个时代，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协调的政治行动和责任感。联合国及其秘书长面临着浩繁的工作和任务。实现人类目标和愿望的责任将需要我们大家的积极支持。

我对此的反应和观点还基于我自己政治生涯的其它重要方面：在有关北南问题的勃兰特委员会以及有关安全和裁军问题的帕姆委员会我都曾工作过。

在勃兰特委员会的“生存规划”和“共同的危机”，以及帕姆委员会的“共同的安全”之后，我将被要求协助制定第三个政治行动的号召：“共同的未来。”当委员会副主席卡利德和我着手进行联合国交付的这项雄心勃勃的使命时，这就是我的主旨。1987年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这个报告，就是这一工作的成果。

今天我们最紧迫的任务也许是要说服各国认识回到多边主义的必要性。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家园的挑战是我们建立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真正动力。寻求持续发展道路的挑战势必会带来刺激力——确切地说，是强制力——推动我们重新探索多边的解决方式以及重新组织国际经济合作体系。这些挑战超越了国家主权的界线，也超越了局限的经济发展策略和相互分割的科学学科的界线。

在全球合作经过15年的停滞甚至倒退之后，我相信，寻求更高的理想、追求共同的目标、增强政治决心以面对我们共同的未来

的时刻已经到来。

60年代曾有过一段乐观和进步的时期。那时，人们对一个更为勇敢的新世界，对进步的国际思潮，曾抱有更大的希望，自然资源丰富的殖民地正在成为独立国家。人们似乎在认真追求合作与交流的理想。相反地，70年代慢慢地滑向了反动和孤立。与此同时，联合国的一系列会议为在重大问题上开展更广泛的合作提供了希望。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使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得以在一起确定人类大家庭对于一个健康的、具有生产率的环境的“权利”范围。紧接着，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人民获取充足的粮食、良好的住房、安全供水以及计划生育手段的权利等问题。

本年代的特点是人们对社会问题关注的减少。科学家们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导到一些关系我们生存的、紧迫而又复杂的问题上：地球正在变暖、对地球臭氧层的威胁、沙漠正在吞噬农田。我们对此的反应则是要求更详细的资料，并向装备落后的研究机构下达解决这些问题的任务。环境退化，以前曾被认为主要是富裕国家的问题，是工业财富的副作用，现在已变成了发展中国家生死攸关的问题。它是互相关联的生态和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的一部分，许多最贫穷的国家深陷其中。尽管从各方面都提出了正式的希望，但至今看不出什么趋势，也没有规划或政策给人们提供缩小日益增长的贫富国家之间鸿沟的真正的希望。作为我们的“发展”的一部分，我们已积聚了大量的武器，足以改变千百万年来所遵循的进化的道路，造就一个我们祖先无法辨认的星球。

1982年，当我们委员会的职责范围最初被讨论时，一些人希望委员会所关心的问题仅仅局限于“环境问题”。这恐怕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环境不能与人类活动、愿望和需求相割裂而独立存在，将其解释为孤立于人类活动之外的企图，使“环境”一词在某些政治场合具有了幼稚的内涵。一些人把“发展”一词也局限于非常狭窄的范围，变成了“穷国变富”应采取什么措施。因此，国际上许多人无视“发展”，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专家和在发展援助领域工作

的人所关心的问题。

然而“环境”是我们大家生活的地方；“发展”是在这个环境中为改善我们的命运，我们大家应做的事情。两者不可分割。那些认为他们的国家已经到了其它国家必须迎头赶上的境地的政治领袖们，也必须将发展问题看成是关键的问题。工业化国家的许多发展道路显然是不能持久的。这些国家的发展决策，由于其巨大的经济和政治能量，将会对全人类争取世世代代持久进步的能力产生深远的影响。

许多紧迫的生存问题是与不平衡的发展、贫穷和人口增长相关的。它们都把前所未有的压力置于本星球的土地、水体、森林和其它自然资源上，这种压力在发展中国家并非最小。螺旋形下降的贫穷和环境恶化是机会和资源的浪费，尤其是人力资源的浪费。这些贫穷、不平等和环境退化之间的联系构成了我们的分析和建议的重要主题。现在所需要的是一个经济增长的新世纪——一种强有力的，同时在社会和环境上具有持续性的增长的新世纪。

由于我们的工作范围以及需要具备广阔的观点，我完全认识到有必要组成一个高质量的和有影响的政治和科学的班子以形成一个真正独立的委员会，这是一个成功的过程必不可少的部分。我们应当在一起估量这个地球，齐心协力地形成一个学科间综合的方法去处理全球所关心的问题和我们共同的未来。我们需要广泛的代表性，成员的大多数应来自发展中国家，以反映世界的现实。我们需要经验丰富的人，来自各种政治领域的人，不仅来自环境或发展等领域，而且还来自能影响国家和国际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所有重要的决策领域。

因此，我们有着广为不同的背景：外交部长，财政和规划官员，农业、科学和技术的决策人。委员会的许多委员是内阁部长或是他们自己国家的高级经济学家，他们主要是负责他们自己国家的事务。但是，作为委员，我们不是代表我们的国家，而是作为个人在工作。因此，在我们工作的时候，民族主义以及“工业化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东方和西方之间人为的界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地球以及对人民、组织和政府正在与之斗争的互相联结的生态和经济威胁的共同的关切。

当我们在委员会一起工作期间，一些悲剧，如非洲饥荒、印度博帕尔农药厂的泄漏和苏联切尔诺贝利的核灾难，看来证明了那些关于人类未来的严峻的预测。在80年代中期，这种预测变得十分普遍。但是我们在五大洲举行的公众听证会上，我们还从受害者那里听到了更为慢性的普遍的灾难：债务危机、对发展中国家援助和投资的停滞、商品价格的下降和个人收入的减少。我们开始相信，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我们社会的组织方式上，重大的变革是需要的。

人口的问题——人口的压力，人口和人权——以及这些相关问题与贫穷、环境和发展之间的联系证明是一个我们必须与之斗争的更为困难的问题。观点的不同在开头时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们需要大量的思考以及超越文化、宗教和区域的不同而对话的愿望。

另一个这样的问题是整个国际经济关系领域。在这些问题上以及在我们的分析和建议中的其它一些重要方面，我们取得了广泛的一致。

我们变得聪明了，我们学会了越过文化和历史的障碍去看待问题，这个事实是最为重要的。在进行共同的分析并取得共同的认识的过程中，我们有过深深的忧虑和潜在危机的时刻，感激和取得成就的时刻以及成功的时刻。其结果明显地比我们中任何一个人所能单独做到的更带全球性，更为现实和更具有向前看的精神。我们带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以及很不同的经历和见识参加这个委员会。经过在一起工作、旅行、聆听和讨论的三年以后，我们提出了一份一致的报告。

我谨借此机会向全体委员致谢，感谢他们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所表现出的献身精神、远见卓识和个人承担义务的勇气。这是

一个真正出色的工作班子。友谊精神以及公开交流、思想见面和互相学习的过程提供了乐观主义的经验。我相信对我们每个人，对本报告及其传达的信息来说，它们是极其宝贵的。我们希望与大家共同分享我们学习的过程以及我们一起经历的一切。如果要实现全球持续的发展，许多其他人也必须经历这样的过程。

委员会得到了各行各业的人们的指导，委员会现在向这些人——向全世界的所有人讲话。这样做时，我们是在直接向人民并向他们建立的机构讲话。

委员会是在直接地和通过其各种机构和部门向各国政府讲话。集中在联合国大会的各国政府的联合体是本报告的主要接受者。

委员会也向私营企业，从一个人经营的企业到大的跨国公司讲话。这些企业的总营业额比许多国家的总营业额都大，并有可能带来具有深远影响的变革和进步。

然而，我们的信息首先是针对人民的。人民的福利是所有的环境政策和发展政策的最终目标。本委员会特别是在向青年人讲话。全世界的教师在将本报告传达给青年人的过程中将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如果我们不能顺利地把我们紧急的信息传达给当今的父母亲 and 决策者，那么我们就有破坏我们的孩子享有健康和提高生活环境的基本权利的危险。除非我们能把我们的话翻译成一种语言，这种语言能传达到青年人和老年人的思想和心中，那我们将不能进行改变目前的发展道路所需要的广泛的社会变革。

委员会已完成它的使命。我们号召各阶层人士，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作出共同的努力，并采纳新的行为准则。本报告所提倡的在态度、社会准则和愿望上的变化将取决于大规模的教育、辩论和公众参加的运动。

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向公民团体，向非政府组织、教育机构和科学界发出呼吁。他们过去在提高公众意识和促进政治变革中

起了必不可少的作用。他们在把世界推向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并为我们共同的未来奠定基础上将发挥关键的作用。

产生这个共同的报告的过程说明，将各种力量联合起来，确定共同的目标以及在共同的行动方面达成一致的意見是可能的。如果个人单独写本报告，每个委员将会选择不同的词句。仍然，我们终于在对问题的分析、广泛的补救行动以及持续发展道路的建议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見。

总之，结论是：进一步发展共同的认识和共同的责任感，是这个分裂的世界十分需要的。

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给我们提供知识和财政支持，向我们讲述他们的要求，介绍他们的经验，从而对委员会的工作作出了贡献。我对每个作出贡献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本报告附件二列出了许多人的名字。我特别感谢副主席卡利德、委员会的全体成员、秘书长麦克尼尔及其秘书处的职员。他们为了帮助我们，作了许多份外的工作，他们的热情和献身精神是无穷无尽的。我谨向政府间会议间筹备委员会主席及其成员表示感谢，他们与委员会通力合作，并给我们鼓励和支持。我也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托尔巴博士致谢，感谢他给我们宝贵的、不断的支持和关心。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

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

(Gro Harlem Brundtland)

1987年3月20日于奥斯陆